

在草岚子监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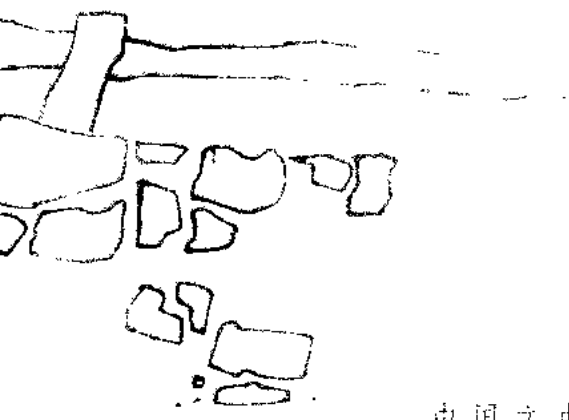
刘昭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在草岚子监狱里

刘 昭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何大钧

在草岚子监狱里

刘 昭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三河县南杨庄装订厂装订

*

1987年6月第一版 ·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5 插页：1 字数：137千字

印数：1—8,000册

统一书号：11224·237 定价：1.50元



作詩題就后（1937年）在北平



敌人为了宣传，让全体政治犯到监狱前院练八段锦



北平和平解放后，春节期间，在北平的战友重返旧监狱聚会合影

从左至右：刘子久（刘俊才）、杨献珍（杨仲仁）、胡耀一、胡锡仁、刘元士、王鹤峰（王德光）、周仲英（周斌）、刘昭（刘北书）、王崖（王伯庆）、刘润涛（刘华甫）、廖鲁言（廖广麟）、安子文（徐子文）、徐子荣（徐之荣）、薄一波（张永璞）、冯基平（冯玉书）

**献给七七抗战五十周年
和已牺牲的战友们**

刘昭同志写的《在草岚子监狱里》，拜读一过，写的很好。因为是写的亲身经历的斗争，所以读来感到很亲切真实。

楊獻珍

一九八五年

三月十二日

前 言

我的一生已到晚年。我一生的经历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动摇走向革命，从黑暗走向光明，历尽坎坷、艰险、苦难和曲折，坚持斗争的历史。从个人的革命斗争历史可以看到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微小的侧面。我早就想从以下几个时期——学生时期、武汉大革命时期、三十年代北平时期、太行山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十年内乱被迫害十二年，写出自己的历史回忆，给中国革命留下点滴的历史资料，也让后代知道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四化和共产主义献身。

在十年浩劫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刘少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冤案，我们都受尽迫害。一九七八年底，经党中央予以平反昭雪。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把当年草岚子狱中同志们坚持长期斗争，忠贞不屈的具体事实记录下来，缅怀在革命斗争中坚贞不渝，英勇牺牲和在十年浩劫中含冤死去的战友，使他们的英烈事迹永垂后世，并以此教育当代青年。

一九八一年，我开始写草岚子监狱难友“邢清玉之死”。写出后送给胡一波、杨毓珍、周仲英、唐方雷、朱则民等同志看，得到他们同意并赞许。薄一波同志认为它是一篇“比较合乎实际的好回忆”。这鼓励着我用了几年的时间继续写完这本回忆录。草岚子狱中斗争经历已近半个世纪，一些情节、时间、地点、人名，不可能记得十分准确，我除了到图书馆找旧报纸查证外，还多次找在京的老同志和有关同志核实材料，征求意见。特别是狱中斗争

的章节，写出来后曾先后送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马辉之、冯基平、唐方雷、刘尊棋、王鹤峰、刘澜涛等同志看过，得到了他们的指教，反复作了修改，力求符合历史实际。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薄一波同志对本书初稿曾在信中指出：“……有些地方叙述不够完善或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我认为这不奇怪，因为毕竟监狱生活，每个人只能了解一个侧面……而且也不可能写全面）……总之，全文思想是好的，写的也是好的，把缺点补起来，则更好些。”经过多次修改后，一九八四年一月，薄一波同志将书稿请周仲英同志分送杨献珍、唐方雷、张彭德、贺致平等狱中战友认真审阅，并进行座谈讨论。再作修改后，又送薄一波同志请教。薄一波同志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信中认为：“就你个人所熟悉的情况而言，写的还是好的。只是谈到整体问题或是党在一定时间的策略问题时，就有些不足之处。比如：绝食七天复食的问题，那时在党支部中间是没有争议的。绝食中我们的阵营非常好，除个别堕落分子以外，大多数同志是争气的。在与敌人谈判时，敌人答应了我们的主要条件。我们的方针是争取敌人答应条件，同时保证在敌人不答应或不履行条件时，继续斗争，以保证我们的势头，这是决策的出发点。以后也证明这是正确的。……”我按以上意见作了最后的修改，才算定稿。因此这本书已不是我个人用了几年时间所写成的，一些老战友也尽了心，出了力，对于他们的鼓励和指教，我衷心感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雷重熙、程里民同志的帮助，中国文史出版社负责同志在本书的定名和整体编修方面提供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刘 昭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一、重新走上革命征途	(1)
二、参加北平“左联”	(2)
三、入团	(8)
四、北平义勇军大队	(13)
五、被捕	(19)
六、宪兵侦缉队	(23)
七、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31)
八、北平行营军法处看守所	(39)
九、草岚子监狱	(46)
十、反“反省”斗争	(52)
十一、病中的郝清玉	(57)
十二、第一次大审查	(62)
十三、Blue的变化	(65)
十四、郝清玉之死	(73)
十五、生活斗争	(76)
十六、我们的革命大学	(84)
十七、Blue的突然袭击	(86)
十八、第二次大审查	(90)
十九、第三次大审查	(93)
二十、隔墙闲话	(105)

二十一、七天绝食斗争·····	(111)
二十二、夜猫子·····	(129)
二十三、争取恢复自由·····	(139)
二十四、出狱·····	(142)
二十五、抗日学生队·····	(146)
二十六、南苑学兵队·····	(150)
二十七、七七事变·····	(155)
二十八、南苑失守·····	(160)
二十九、北平沦陷·····	(165)

一、重新走上革命征途

一九三〇年夏，我这个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浪涛中沉浮过的二十一岁的青年，历经坎坷，从武汉到了南京，住在十叔刘觉民住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职员宿舍（十叔在该校任教员）。我想去广州考航空学校未能如愿，找工作也困难，只好借用十叔的高中毕业文凭，改名刘光书（十叔的原名），考上了国民党军政部北平陆军军医大学。九月到北平东四六条东口军医大学报到入学。大革命失败脱党后两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算是告一结束。我下定决心，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埋头上学，学得一门本事，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

初入军医大学，比较熟悉接近的同学有符沙、黄香荀、覃睡僧、廖广麟。符沙是湖北武昌人，比我高两年级，是符号的弟弟。符号是一九二七年我在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入伍生总队（算黄埔第五期）第五队的同学。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和符沙特别亲近。黄香荀、覃睡僧，他俩和我是四川同乡；黄香荀和我还是同在南京考上军医大学，同道到北平的。廖广麟，南京人，细长个儿，双眼皮，红白的脸庞，是个英俊的青年。

符沙的嫂嫂（符号的爱人）是谢冰莹，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谢冰莹也是武汉军分校女生队学员。她中等身材，瓜子脸。一九二七年夏，蒋介石指使夏斗寅、杨森进攻武汉革命政府，武汉军分校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师长叶挺指挥，开赴前线，击退了夏斗寅、杨森。当时我们第五队编为独立师师部特务连，符号和我分别担任三、六班班长。女生队编为师政治部宣传队。特务连同宣传队经常配合一起进行群众工作，因此我同女生队的一些同学谢冰莹、黄杰、曹宪植等都很熟悉。谢冰莹是女生队的活跃人物，她在前线写了一本《女

兵日记》，丰子恺给它画了封面，曾名闻一时。我们在武汉分手后，还不知道她和符号结了婚。

星期天，我和符沙去谢冰莹住的公寓里见到了她。他乡遇故人，彼此都很高兴。她用大姐姐的口气关切地问我：

“小刘，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什么也不想干了，只想埋头学点吃饭的本事。”

“那你不想革命了？想开倒车，不行！我介绍你参加一个团体，你敢吗？”

她“将”了我的“军”，我有点脸红，但我不甘在女同学面前示弱：“有什么不敢！什么团体？”

“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啊，原来是文艺作家团体！我想没有什么，加之我又爱好文艺，就答应了。

二、参加北平“左联”

十一月初的一个星期天，符沙告诉我，谢冰莹要他同我去清华大学找刘尊棋，算是正式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刘尊棋高大个，黑红的长圆脸，是个文静的大学生。他很热情地欢迎我这个新盟员（符沙已是“左联”盟员），向我讲了一些“左联”的活动。我们三人编为一个“左联”小组，他是小组长。刘尊棋是苏联塔斯社的通讯员，他的桌上摆着一台英文打字机，他给我们表演了一番熟练的英文打字技术。

黄香荀是在家乡四川达县参加革命被通缉跑出来的，我们关系很亲密，不久我介绍他也参加了“左联”。军医大学有符沙、我和黄香荀三个“左联”盟员，就单独成立了一个“左联”小组，符沙任组长。

我是“左联”盟员，得学点“普罗”文学，便开始借这方面的书来看。我看过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铁流》，美

国辛克莱的《石炭王》和《煤油》，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它们重新激起了我的革命热情，死灰在缓慢地复燃。

我们经常去公园开小组会，有时“左联”的负责人也来参加，他们是老潘、大潘和小潘。

一九三一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得到通知，我和符沙、黄香菊去西城中国大学礼堂听×××讲演。到会的有一百多人。我看到谢冰莹、刘尊棋、老潘也在座。几个警察和便衣侦探也钻进来了。这可能引起大会主持人的警惕。等了好一会，台上一个穿长袍的人出来说“讲演的人因事不能来了，散会”。站在台边的一个青年随即向台下散传单。人群抢接了传单就纷纷散去。我们抢接到一张传单，署名是“中共北平市委”。我好象久处黑暗，突见太阳，感到惊心刺眼，又感到火热暖人。啊，是党！是母亲！三年了，我脱离了党，何时再能回到母亲的怀抱呢？

符号不在北平，他和谢冰莹两地分居，关系好象已经破裂。三月，有人传出消息：公安局的黑名单上有谢冰莹的名字。她在北平不能呆了，要去上海。临行，我和符沙去给她送行。以后听说她同中华书局的顾凤城结了婚。我回忆北平这段历史，总想到她，是她在迷途中拉我走上了正道。

一九三一年夏，符沙在军医大学毕业离校，去南京听候分配。符沙走后，由我接替他担任“左联”小组长。

暑假，我回四川荣县鼎新场棠市口老家探亲，母亲要我把在县城里上初中一年级的妹妹和因在家乡参加农民暴动、担任过儿童团长被通缉流亡在重庆仅十三岁的弟弟，带出四川，由我供给上学。我家是破落地主，供给他俩上学很困难。父亲已年老，原是清朝秀才，在外县中学任教，已被辞聘，顾不了他俩。但我上军医大学虽然是官费，每月只发给十二元津贴，除去八元伙食费外，只剩四元零花，也实在无力管他们上学。不过我相信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敢闯就行。一九二六年我中学毕业，家里供给我上大学有困难，我就是只带八元路费出川，自奔前程的。我对他

们说：“你们要不怕讨饭，我就带你们出川。”我要他们作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母亲还是竭力张罗了一百元大洋让我带他俩走。

到了汉口，为了减轻负担，我把弟弟打发去上海找好友张级。张级是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长沙分校的入伍生，与我在武汉军分校的同队同学刘先沛是原长沙湘雅中学同学。一九二七年秋，张级在程潜的第六军十九师五七团任排长，我在五五团任排长，经刘先沛介绍，我们相识，成为挚友，不久他介绍我参加了十九师内的共产党秘密组织。十二月，又在他的鼓动下要去皖北联络大刀会，想自己搞一个局面，跟着他脱离了党。为了安置弟弟，事先我曾去信征询他的意见，他回信表示欢迎我弟弟去。我只带妹妹回到北平，托人把她送进了香山慈幼院办的免收学杂费的师范学校，把从家里带的剩余的钱给她交了一个学期的伙食费。

我回北平不久，“九一八”炮火轰响了！它完全震醒了我消沉的梦。沈阳失陷，东北河山变色，华北也危机四伏，国难当头，祖国儿女谁能安心上学，不奋起抗日救国！

我在“左联”的活动积极主动起来。我同黄香荀商量，以“砥砺学术，联络感情”为宗旨，发动全级同学，组织灰色“级友会”，并以此为基础，扩大组织军医大学全校校友会，以便广泛团结同学，进行抗日救国活动。经过解说，很多人表示赞同。廖广麟开始也无意见。但在成立大会上，却没想到廖广麟竟不赞成，他说：“我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砥砺学术，联络感情，没有组织级友会的必要，而且组织起来是不合法的，还会引起麻烦。”他这一瓢冷水竟把大会泼散了。我当时很不满意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干。军医大学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它的党员多是高年级的学生，在他们的宿舍区还挂出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医大学区分部”的牌子。

入冬，临近军医大学建校二十×周年，学校要举行庆祝，准备演戏和出纪念专刊。每班选出一名代表组成筹备委员会，进行

筹备。我们班选了我。高年级几个班选出的代表多是国民党员，他们包揽了筹备工作。但他们只顾抢权，讲排场，出风头，他们把筹委会主任、总务股长、游艺股长的职位抓到手，就出高价请程艳秋的高徒新艳秋来校演出京剧《玉堂春》，他们自己也排练了几出戏在台上演出。他们把纪念专刊的主编分给我负责，这正合我的心意，正好利用它宣传抗日。我写的发刊词，除了宣扬军医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的成绩外，就加进了抗日的内容，提出了“中国人誓死不当亡国奴，军医大学同学要作保国卫民的白衣战士，光荣的岗位在抗日的前线！”国民党区分部的一名委员写了一篇拥护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共文章，送来投稿，我给他压下了。

纪念专刊编好，印了一千册分发全校师生每人一册，还给其他学校各寄了一份。那位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看见他写的反共文章没有刊登，找来同我吵闹了一番。我只说：“投稿太多，篇幅有限，所以大作没有登出。”他没办法，只好了事。但这竟引起了他们对我的注意，我却毫无警惕。

一九三二年一月，寒假中我去上海看望张俊和弟弟。他们住在一个亭子间里，屋子里只放两张行军床、一张小桌和一个凳子。我去了，弟弟只好睡地铺。一九三〇年初张俊曾去广州中山大学旁听，写过一篇什么考察记，在中山大学的刊物上发表，得了五百元稿费，就到上海来找党，他已经同党有了联系，准备回长沙。

我们相互谈了别后两年的情况，他对我在北平“左联”的活动表示赞赏。他说：“个人的命运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是不可分的。在此民族危亡之际，读书不能救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抗日救国，才有个人的出路。”并说：“我们脱离了党是错误的，我来上海已经同党有了联系，就要回长沙去。你回北平要积极找党。”张俊是我最敬佩和最亲密的师友与同志，他的话鼓励了我找党的决心和勇气，实际上

我已经深刻体验到，离开了党干革命是一事无成。

上海法租界一个地方存放着两箱子珍贵的马列主义书籍，那是一些被捕和离开上海的同志留下的，张俊拿到了取书的条子，写着什么暗语，他自己不便出去，又一直找不到可靠的人去取，就要我去给他取回。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上海街上和租界里，国民党侦探特务和外国巡捕时常突然“抄靶子”，就是断绝交通，对车辆行人进行搜查。张俊要我小心提防着。我大胆谨慎地去取了书，叫了一部人力车运回来，幸而没有出事。这次取书，使我想起一九三〇年夏，我在南京住在十叔处，一位住在浦口的前武汉军分校同学来看我，借去了一本苏联小说《血痕》，他看完从邮局寄还我，我没收到。一天，两个便衣侦探来拘押我去他们稽察所，说是查到了寄给我的违禁书。是什么违禁书也不给我看。十叔赶来才把我保释出去。后来那位同学来谈到他借去的书已经邮寄还我，我才恍然悟到原来他们查到的违禁书就是那本《血痕》。我把这件事告诉张俊，他说：“这两箱子书要查出来，你准得坐牢。”我说：“我是准备好了的。”

我去上海不几天，就遇到了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动手了，国民党当局仍然是不抵抗，要和平解决。二月一日，上海爆发了“反对不抵抗！”“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几万人的大示威游行。张俊得到通知，要我和弟弟一同去参加。汹涌咆哮，震天动地的示威洪流，使我感到一种不可阻挡，冲毁一切的群众的伟大力量，唤起了我对武汉大革命的回想，更激起我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

两天后，张俊同我和弟弟收拾行李，带着两箱子书一起到南京就分手了。张俊住到他的未婚妻李爱莲——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明灏的女儿家里，准备结婚后即去长沙。我带着弟弟回到了北平。

回北平后，我把弟弟安置在四川会馆办的四川中学上初中。四川中学的一位图书管理员张建勋对他很照顾。张建勋是一位老